

张晓林 张德明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张晓林 张德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71,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476-1/I·391 定价：1.85元

都这么说：

教师是太阳底下
最光辉的职业

——题记

目 录

上篇：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写给我亲爱的国民

- | | | |
|---|-----------------|--------|
| 1 | 圣人中的圣人 | (2) |
| | ●不忍卒听的话 | (2) |
| | ●我们的复旦 | (3) |
| 2 | 国人并不知晓 | (6) |
| | ●这些人的名声不如瓜子大王 | (6) |
| | ●她的研究成果不能写成论文发表 | (7) |
| | ●“红楼”疑梦 | (9) |
| 3 | 苏步青和谢希德 | (11) |
| | ●不会被毁灭的业绩 | (11) |
| | ●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 (15) |
| 4 | 精神文明之发端 | (18) |
| | ●一封罪犯的信 | (18) |
| | ●一封孩子的信 | (19) |
| | ●师之德 | (21) |
| | ●人间自有真情在 | (24) |
| 5 | 共和国的“开荒牛” | (31) |

● 奋争的开拓者(31)

中篇：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写给中国大学教师

- 1 不愉快的联想(39)
 - 冤案，在复旦成手计(39)
 - “高贵者最愚蠢”(40)
- 2 每一个人都有叙述历史(43)
 - 悲剧是撕碎了给人看的美(43)
 - 天花板砸下来无怨言的人(45)
 - “我亲手创建的实验室成了
 关闭我的‘隔离室’”(47)
- 3 不妨诘问一下自己(51)
 - 一位伟人和一批崇拜者(51)
 - 安于贫道？(53)
 - “神州大拼搏”(57)
 - “虎丘塔”倾斜，是否有内力
 起作用(60)
 - 何谓落实政策(63)

下篇：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写给共和国的领导人

- 1 “最好时期”与“教育危机”
 - 和领导对话之一(69)
 - 教师情绪略述(69)

- 一位大学教授对市委书记言：
 我在忙着抓养猪(71)
- “黄牌”警告，来自国内外(77)
- “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发展不够”(79)

2 国宝们的窘迫相

- 和领导对话之二(84)
- 一些数字和一个理论问题(84)
- 一句流行话的最初版本(86)
- “不忍心多看他们”(87)
- 一位青年教师的苦恼(89)
- 令人忧虑的消息(91)
- 砍去人均寿命的十年差有何方(95)

3 留名当留万世名

- 和领导对话之三(97)
- 丁石孙和华中一对采访者说(97)
- “先让小孩读书，然后再买冰箱”(106)

结束语：归来吧，中国魂。

上 篇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写给我亲爱的国民

1 圣人中的圣人

●不忍卒听的话

八月，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招生处都是玫瑰色的。“黑色的七月”拼搏纷争后的玫瑰色将在这个热浪滚滚的岁月里呈现出来。武装警察守卫着的这块决定产生新一代中国青年才俊的地方，警戒线外，成百上千的高中毕业的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师长、兄妹、亲朋聚集在这儿，等待着任何一个从这里进出的招生老师和工作人员，似乎胸前别着无论什么红底白字大学校徽的人都将是带给他们福音的上帝。他们打听着任何一个哪怕是极细微的招生信息；讨好的面孔、急切的期盼，乃至求救的神情。当然，偶尔也能从片言只语中猜测出或分析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进入哪一所中国的高等学府，还可能猜测起将来，及将来的将来，也许有优越的职业，也许有受人青睐的出国深造之途，也许能受到的敬注的目光等等。玫瑰色后面总该是紫色的霞光吧。啊唷，人们也太功利主义啰，在这几天以前，或在这几天之后，他们的上帝或许只是装煤气的，管房子的，批条子买紧俏商品的，当官的，或是掌握着各种各样权力的人。

1988年，笔者因工作关系随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强连庆副校长去“视察”招生情况时，确是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我们也和许多进出这个门的工作人员一样受过这样的“注目礼”。多年参加过招生的老师说，每年都是这样，每个省都是这样。但在录取工作室里，我却听到了一句不忍卒听的话，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李良荣先生指着自己正在审阅的一大叠考生的案卷对我说，“在这里参加招生的老师，恐怕谁都会接到过几个电话，几张条子，几个口信，在门口受到人们亲切的‘围攻’，全国的大学教师可能就是这几天最值钱。”过了不惑之年的李副教授说这句话时表情异乎寻常地严肃。“事后，我没再问过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心境，但我听了这话后，心里不是个滋味。我也已到了不惑之年，当然，我不会心里发酸得当着人面掉下眼泪的。

中国的大学教师就是这几天最值钱??

中国347,275名大学教师(1985年统计)同仁们，全国的5324名教授先生、31749名副教授先生、152866名讲师先生、157324名助教和教员先生们，在中国十一亿人口中，你们难道只是这几天最值钱吗?! ——我们心里在呐喊。

现在全国有1075所大学。我们孤陋寡闻，我们不能尽知每个大学的教师价值，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复旦。

●我们的复旦

我们的复旦大学在中国上海。它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我们爱我们的老师。我们爱我们全国所有的大学教师。

我们想，我们的国民也应象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老师，去知晓他们的价值。你们不能不爱啊，我亲爱的同胞们。

他们对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八月的那几天。

我们的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说，有人把教师比作红烛，有人把教师比为园丁，这都不够恰当。红烛燃尽，它的光亮就熄灭了；园丁培育花朵，也只不过供人观赏。而教师的业绩却是继往开来的；他们的学问、知识，将为学生传下去，他们培育的人才，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一批批生力军。在社会进化的长河里，教师的影响是深远的，教师的功绩是永存的。

把有着六十多年大学教龄的苏老先生的话引录在这里，如果有给我们自己捧场之嫌的话，那么下面这段肺腑之言总还能稍稍扣动一下我们的心灵之弦吧——

你们还记得下来吗？

“矿物的硬度有十种，不信我给你们背：滑、膏、方解、莹、磷、长、磷、黄玉、刚、金刚。你们知道这是谁编的吗？这是我的大学老师李士博编的。他把这个非常有用的顺口溜教给我们，使我至今都牢记着。还有教几何的傅仲荪老师，他古文水平很高，用桐城派古文编的讲义读起来拉着腔，很带味。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是，讲几何道理时，他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公理，定理一定如此，没有第二个。不仅在教室里如此，在中

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拿到火星上也是如此。教国语的董鲁安老师，1935年初夏，我出国之前去北京看望他，他很高兴地端出一盘猪肉饺子。可是，他自己却不吃，说他是信佛教的，吃素，遗憾的是，当我1955年回国时他已病故了……，我终身感谢我的老师。”

对读这篇报告的读者，不一定都能知道傅仲荪、李士博、董鲁安老师，但你们不会不知道讲这番话的人，曾经在二次大战后任美国国防科学顾问委员会火箭部主任，后来当过中国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主席的一代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

科学家是圣人。他们创造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果，远的不说，在本世纪就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成就问世：塑料、智商测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血型、农药、电视、植物培育、网状系统、抗菌素、汤恩头盖骨、原子裂变、爆炸理论、避孕药、精神病药物、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统计学、脱氧核糖核酸、激光……。但是没有哪一位科学家会否认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老师把他们引入门的。

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卢鹤绂先生说，小学、中学教师教会我生活的本领，大学教师教会我发现和发明的本领。

呵，老师培养了圣人。

老师是圣人中的圣人。

2 国人并不知晓

●这些人的名声不如瓜子大王

当代中国三十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某一年，中己的北部近邻为边境问题曾发生过争端。那位近邻曾蛮横地把许多本不属于他们疆域的土地强词夺理地认定是他们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胸有成竹的中国政府谈判官员曾经怎样在谈判桌上拿出一件件足以证明五千年华夏之疆域一朝一代是如何界定的证据的。他们提出的重要证据之一是，早在某朝某代，哪一块地方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某朝某代哪一位官员在那里当过节度使；某朝某代某人在那里当过朝廷命官。历史是抹不掉的，谈判对手脸上露出了惊讶和尴尬。

法国哲学家华莱理说过，“科学，就是把许多成功的秘诀收集一起。”而现在这“收集在一起的成功秘诀”的科学成果摊在谈判桌上，为国家外交谈判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项科研成果就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八本七彩绘制的历史地图集是这个研究所几代人工作几十年的心血（后来它获得过科研特等奖）。许多年来，

国家某个机构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水利开发利用的情况，找到过这个研究所；某个机构要研究中国历史上蝗灾遍布的区域，也找到过这个研究所；……他们对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所作的贡献并不一定都是见之于报端的。

在这里的人，年轻的进去，现在头发已染上了白色。他们的名声甚至还不如当了瓜子大王的个体户、唱一首歌而扬了名的流行歌手。谁知道他们哩？谁认识他们哩？我们敢说，除了谭其骧教授以外，这个研究所的许多专家学者，国人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和姓。

人啊，并不都是以知名度来衡量他们所做业绩的价值的。

复旦大学有二十三个研究所，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她的研究成果不能写成论文发表

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了，那是在他辞离人世之后，报纸宣传了他的事迹的缘故。他确实是伟大的。电视片《祖国不会忘记》又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民族英雄。王淦昌，这位发现过反西格玛灵荷子的科学家，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化名王京，在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在郭永怀文集中，文稿只收集到1957年，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力学家当祖国需要时，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国防科技事业中，放弃了个人著书立说的机会。原子弹上天，是一个国家科学达到了某一水平的标志。邓稼先和其他已被揭露和还没有披露名和姓的中国原子弹的父母及助产士确是伟大的，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是默默地干了一辈子。

某一天早晨，从虹口公园开出的 9 路电车上，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突然晕倒了，人们从她戴着的校徽知道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同车乘客搀扶她起来后要她到附近的建工医院去看一看，她拒绝了。她硬撑着到了学校，又进了她的物理实验室。作为妻子、母亲、教师的她太累了，几十年都是如此。清晨四时多起床，买菜，料理家务，上班，做研究，然后带着疲惫的身躯再挤公共汽车从上海东北角回到西南角的居室。她的研究成果甚至在一个学校里的人都不知道其价值。然而就是她，在五、六十年代被国防科技战线誉为“五朵金花”之一，是一位立过功的人。她不能享受公开宣传的荣誉，甚至连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写成论文发表。在平常人眼中她是一个平常的人，站在众多的人当中，她没有比其他人突出的地方。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留着齐耳短发。李郁芬，你们知道她的名字吗？不知道。真的，你们不一定知道这个名字。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她，知道还有许多别着红校徽的平常人是值得我们敬重的，那就行了。我们介绍过，复旦大学有八百名正副教授，李郁芬只是其中那么一个。当他们因为无法挤上公共汽车而不断焦急地瞧着自己腕上的手表时，当他们连时下只有送礼才能办事这一点都不懂而去求助于有权力的人帮助解决一下煤气罐时，当他们去医院看病望着长长的候诊队伍叹口气终于离开医院大门往回走时，你们能把他们当作价值连城的国宝，给以小小的方便，他们也许就心满意足了。要知道，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

●“红楼”疑梦

历史名著《红楼梦》现在几乎是全民皆知，这得归功于电视连续剧。孩子们也知道《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鹗写的，“曹著高续”，几十年来就是这么论定的。

插现在复旦大学有一位先生对此异议了。提出这个红楼成书新说的是运筹统计系的副教授李贤平。他在以往红学研究成果和大量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用电子计算机以数理统计的方法得出自己的研究结果。在综合性大学文理结合搞科研，数学家研究《红楼梦》并不出奇。就象研究生物的专家与历史地理所的专家合作研究蝗灾一样。

年过半百的副教授先生不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激动的人，他是这样冷静平淡地阐述自己的想法的：

“1986年，我去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进修访问，发现《红楼梦》研究在异域也是那样炫目，特别是著作权问题，众说纷纭，这更增强了我的民族自豪感和研究决心……”

“美籍华人陈炳熹先生曾提出过《红》著‘一人说’，我便想以现代科技的方法来重新考证传统的‘曹著高续’说。我是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红》著的，有‘量’的渗入，应该说比索引或求证更为科学、准确。由于各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词汇的运用规律也就各不相同，犹如世界上绝不存在两个相同指纹的人一样。”

“为了检验这种分辨能力，我曾请复旦的一些师生帮忙对《儿女英雄传》一书以类似的方法进行了处理，结果证明‘定量’分析法有分辨作者是与非的能力，与情节无关的虚

字的使用习惯和出现频率，是可以显示作者的写作习惯与风格的。

“在国外，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文献著作权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坚持我的立论：即曾有人作过《石头记》一书，而曹雪芹在年轻时写有《金瓶梅》式的《风月宝鉴》，后曹将其书分散插入《石头记》，并增添了具有深刻内涵的许多内容，定名为《红楼梦》。曹雪芹去世，他的亲属又收集了尚存的各种草稿，整理成一百二十回，由程伟元、高鹗最后加工而成。但我并不认为我的立论就是定论，我更希望有人能充实这个新说。”

“红学”是否已处于变革的边缘，我们并不敢肯定，但科学就是发现和发明，这我们敢肯定。能够成功的学者们恐怕都存在这样的信念：昨天的成就也许会成为我们今天最大的负担和障碍，只有智慧和热诚，才能把今天的事做得更好一些。1988年11月，在一列火车上我们聆听到复旦大学教务长、另一位数学家严绍宗教授阐述过的一段话，更加佐证了我们的推断。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后，数学界曾根据推导的数学公式论证了宇宙间的‘黑洞’的问题，而我在怀疑‘黑洞论’是否正确，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某些方面也值得怀疑，科学是无穷尽的。”高大身材的数学家凝望着车窗外金秋之景说的这番话，决计不是他心血来潮的遐想，我们想。

3 苏步青和谢希德

坐在这间并不宽畅的办公室里，写下这个题目，我的脑子里又清楚又朦胧。电光源专家蔡祖泉设计的萤光灯把室内照得通明透亮，而我眯着眼，看着桌上的各种公文，似乎想从中找到我想写的东西。无疑，我想写写我们的两位校长：名誉校长苏步青和前任校长、现学校顾问谢希德。他们是政治名人，国人都知晓他们的。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位是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主席，而我不知道该怎样写他们。

朦胧中我在思想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并不是政治家，而是教师；苏步青和谢希德是数学大师和物理专家呀。我努力思索着，我怎样朝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地方走去。

●不会被毁灭的业绩

由于有过一段与他们不太短的接触，我的情绪记忆中有许多积淀着的能够掂出份量的东西，不知怎么，我却记起了一个不光辉的年代里的小故事。这个故事越清晰，我的心情就越不平静，我忙找出苏步青秘书王增藩做过的一段文字记录，上面这样写着：